

关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的思考

章 政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我国正处在一个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近年,各种城镇化模式不断涌现,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城镇化实践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可能会出现城市与农村对立发展的局面。城镇化的关键是缩小城乡差距;当前,我国城镇化的最大隐患是基础不稳,核心问题是质量不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对城乡协调发展的认识尚不完整。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乡协调;半市场化、半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3-0151-0007

我国的城镇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全面推开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在总体上呈现出起步晚、推进快、差异大的特点。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的城镇人口从1.7亿增加7.1亿,增加了5.4亿人。其中的主体是进城农民工。35年来,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由17.3%提高到52.6%,从全国来看,各地的发展水平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近年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已步入快速发展时期。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和乡村、市民和农民之间在资源禀赋、社会机遇、制度保障等方面的差别开始变得日益明显。具体来看,特别在教育、医疗、就业、收入、消费和公共资源等多方面的矛盾尤为突出。今后,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无疑将会进一步拉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反之,则有可能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所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刻把握当前城镇化面临的问题、理清我国城镇化的基本方向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一、城镇化的相关理论

长期以来,城镇化发展滞后构成了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城镇化载体的产业支撑能力比较薄

弱,二是作为城镇化核心的人力资本积累相对不足。前者反映了城镇化的经济基础尚不稳定,后者反映了城镇化的社会基础仍不健全。为了从源头上厘清上述问题和矛盾,我们认为,首先有必要从传统经典理论的角度进行梳理和把握。

1. 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

所谓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就是指拉动城镇化的主导产业的遴选和定位。对此,国内外有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在理论上影响较大、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类,即刘易斯模型与拉尼斯—费景涵模型。

刘易斯模型(Lewis W. A),是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最早提出的,其核心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即在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农业部门的作用是为工业部门提供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将逐渐由二元转向一元,最终变为一体。这里,刘易斯模型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认为工业部门在一个经济体中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始终处于从属和提供资源的地位。二是认为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水平也非常低,仅仅能够维持生存。也就是说,这个理论的最大不足在于忽略了农村和农业内生增长的巨大作用。

拉尼斯—费景涵模型(Ranis—Fei model)^①是20世纪60年代,拉尼斯和费景涵两位学者在考察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后,对刘易斯模型进行的改善。他们提出了一个假定,即经济体在开始阶段,大多数人口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其中一部分人的边界生产率可能为负。当工业部门出现以后,农业生产部门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转移出来,随着转移的加大,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开始提高并趋近社会平均水平。这时,只有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共同发展,才能促进整个经济体的发展。他们指出,农业部门的作用不仅在于为工业部门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料和劳动力,同时,由于农业部门具有独立的市场地位,农业部门的发展是工业部门发展的基础,两者只有平衡发展,才能让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为一元结构,即所谓的平衡增长模式。

对照上述两种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在历经了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和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以及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快速提升之后,接下来,城镇化的方向和道路究竟如何?如果按照刘易斯模型,由工业部门替代农业部门,进而演变为一元经济结构的发展道路显然在我国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在农业部门自身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的基础上,通过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协调发展,来保持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平稳,这将是今后我国城镇化的一个基本思路。

2. 城镇化的人力资本支撑

所谓城镇化的人力资本支撑,是指伴随着城镇化发展,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引导和教育农民从农业劳动力转变为城市产业工人,实现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即解决“化蛹成蝶”的问题。不过,与上述产业支撑问题相比较,人力资本培育目前还没有一定的范式可依循。这里,不妨假借两种比较经典的农业劳动力改造理论,即恩格斯著名的“小农改造思想”和舒尔茨的“农业劳动力投资理论”做一个比较。

早在1894年,年逾古稀的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对于社会主义如何培育现代农业劳动者给出了细致的分析,特别是对于改造小农,恩格斯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他明确地说:社会主义的职责,甚至它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对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占有,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至于这样做的理由,他解释道: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和劳动分离开来,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这种结合的未来形式就是合作社。其实,恩格斯提出的是一条通过让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方式来完成对农业劳动力的自我改造,以实现培育符合社会主义大生产需要的新型劳动者的目的。

与上述较为理想化的恩格斯的农民改造理论相比,1979年诺奖获得者(Thodore W. Schults)的分析就显得尤为简单明快。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未来的前景”。舒尔茨指出,农业部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的改造和人力资本的提升,这个过程是以劳动者的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技术、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表示,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他认为,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经过一定的周期,就像土地、技术等实体性要素的培育一样,才能在生产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从实践的角度看,培育新型产业劳动者必须改善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由上可见,培育新一代符合城镇化和现代化要求的合格劳动力,不仅是一项紧迫任务,而且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项工作已是迫在眉睫。因为按照传统理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历经一个相当长的周期。因此,在未来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缩短这个过程,尽快地形成与城镇化发展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条件,将是我国城镇化实践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① 拉尼斯—费景涵模型(Ranis—Fei model)是一种从动态角度研究农业和工业均衡增长的二元结构理论。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涵(John C. H. 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在《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一文中提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改进,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

二、我国城镇化实践面临的主要问题

1. 城镇化实践中的两个误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把城镇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为推进城镇化实践指明了方向。但是,在现实操作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对城镇化的理解和认识,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的两个误区,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简单地把城镇化管理为“造城”和土地开发,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或者叫消灭农村,这里不妨称之为“城市规模论”。我们知道,城镇化虽然会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但是,不能简单地从表面上理解这一现象。如果把城镇化等同于发展房地产业和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城市病的蔓延,耕地占用的加剧,人口的过度积聚等,这些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第二,片面地把城镇化管理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认为只要加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可以实现城镇化,这里不妨称之为“人口转移论”。在现实生活中,城镇化虽然会伴随着一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但是,如果只是片面地理解这一转移现象,同样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城市就业、教育、医疗、治安等问题的并发,以及农业劳动力的高龄化、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村庄功能的萎缩等新的社会问题的蔓延。

上述问题,反映出一些地区对城镇化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感性的层面、停留在简单的“城市扩张论”和“工业替代论”的层次上,缺乏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的理解,说穿了,还是单一经济发展观的结果。必须指出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了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其内涵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推进、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其核心思想是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从实践来看,如

果只有城市规模的扩张,没有农村社会的发展;只有城市经济的繁荣,没有农民收入的提高,这样的城镇化必然会加大社会矛盾、引发新的社会不稳定。

2. 城镇化的最大隐患:基础不稳

城镇化,通常是城乡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又构成了城镇化的重要基础。走农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首先必须有效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不断提升要素的综合生产率。改革开放的初期,从1980年到1990年,当时由于乡镇工业的崛起,许多农民在离开土地以后进入到乡镇工业,这既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又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著名的“苏南模式”和“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发展过程就是如此。这种“内生式”的城镇化的一个特点,是“自下而上”不断完善,比如“苏南模式”从出现到完善就历经了十多年的时间。

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传统农村社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过程,其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活动处于长期均衡的状态。几千年来,在中国农村,这种均衡惯行的影响,常常使得各种试图改变和打破这种平衡的努力受到挫折^①。从实践来看,我国农村一直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济单元,其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的小规模生产。由于内生动力匮乏,即使在外部条件改变之后,也会因为激励条件不充分或不连续而使得这种小生产难以扩张,进而使得农村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为了摆脱“被抑制”的人力资本和产业活动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往往会采取较为简单的“外延式”或“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这就使得城镇化的过程潜藏着巨大隐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实践,农村经济取得显著发展,但同时也诱发了一些地区开

^① 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状态,农业经济学者黄宗智称之为“高水平均衡的陷阱”,旨在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改造传统农业中,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始城镇化扩张的冲动。在一些地方,由于产业支撑和人资本条件的相对匮乏,为了摆脱发展的约束,往往将城镇化蜕变成了“圈地”“造城”等粗放开发,甚至通过诱导农民上楼等方式,制造了很多“空心村”,形成了一大批“三无”(无钱、无地、无业)农民,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问题^①。这种“外延式”的城镇化扩张,在经济利益和主观意志的驱动下,由于无法解决产业发展的“长期均衡”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短板效应”,最终将会因为支撑条件的不足而难以持续。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首先必须夯实城镇化的基础。这里,一方面要改善农村产业立地条件,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育,确保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城镇化就是好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和“空中楼阁”。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时候,一些地方也许可以凭借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涨来弥补投资不足和收入下降的影响,甚至可以“昙花一现”,出现短期的繁荣。但是,随着经济运行的平稳和资源开发的殆尽,一旦经济运行回归正常,就会因为缺乏内生动力和竞争优势而一蹶不振,最终无法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和稳定发展。

从长远来看,为了实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特别要注重对包括转移劳动力在内的庞大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进行提升,通过对个人行为、公共意识、道德素养等的培育,实现对农民思想的改造。这是因为,城镇化的发展已经使得每一个城镇成为人口高度聚集的社会单元,在这里,最重要的已经不是人口数量的积聚,而是人口素质和公民意识的提高。如果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只是把大量的小生产者迁移到城市,将会由于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使得整个社会经济秩序产生巨大混乱。因此,只有不断加强农村城镇化的基础,提升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本的支撑,努力创造“帕累托改善”的条件,才有可能使城镇化摆脱上述“基础不稳”的风险,实现农村和城市的协调发展。

3. 城镇化的核心问题:质量不高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与西方国家的道路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不仅拥有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体,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新兴市民(农民工)阶层。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不仅要解决农民工进城的问题,还必须解决进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即完成农民工“二次城镇化”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二次城镇化”过程进展缓慢、质量不高,具体表现在“半城镇化”和“半市场化”两个方面。

所谓半城镇化,是指在人口结构上,我国目前正好一半在城市一半在农村。按照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城镇化率”计算,目前的城镇化率为52.6%,即我国已经实现了一半多人口的城镇化。但是,城镇化率只反映了一个看得见的城镇化水平,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城镇化水平”,那就是已经生活在城市的一半多人口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尽管他们生活在城市,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依然是小生产式的。比如,目前城市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秩序问题、质量问题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落后意识形态和行为影响结果。由此可见,“半城镇化”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反城镇化”的行为,暴露出我国城市中“公共意识”匮乏、“市民文化”薄弱的问题,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质量不高”的一个表现。

所谓半市场化,是指在城镇化的实践中,“市场之手”的作用尚不完全,而“政府之手”的影响依然强大。应当看到,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市场手段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管理的主要工具和调控手段,例如,价格、利率、税收、债券等。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阻碍市场机制的东西仍在经常发生作用,比如户籍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保险制度等,其中很多内容是优先市民、歧视农民的差别化措施。这里,不妨称之为“半市场化”现象。可以说“半市场化”在本质上是一种“逆市场化”的行为,它是通过一系列制度范式把农民阻隔在城市

^① 据统计,2012年底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达到2.7亿人、全国流动人口为2.5亿人。(《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之外,是我国现行市场制度的一个缺陷,它使得原本已经十分尖锐的城乡矛盾和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质量不高”的又一表现。

上述现象,揭示了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从根源上看,“半城镇化”现象,主要是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属于个人意识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相比之下,“半市场化”现象,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现行管理制度和规则的影响,属于政策和制度层面的问题。这里,如果把“半城镇化”看作是城乡差别的个体表现、属于个人的“认识困境”的话;那么“半市场化”应该就是城乡差别的群体表现,属于整个社会的“制度困境”。二者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了我国城镇化进程缓慢、发展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

为了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必须破解上述双重难题。很显然,如果只解决“半城镇化”的问题,固然比较简单,但后面的问题仍然会层出不穷。例如,近年许多地方出现的“圈地”“造城”现象就是如此。因此,必须从问题的核心入手,只有把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城乡对立思想和不合理制度颠倒过来,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确保城镇化目标的实现。为此,我们认为,应该首先针对“半市场化”等制度问题进行突破,通过打破城乡壁垒、实现市场要素的有效流动,在一个公平的制度框架内,寻求对“半城镇化”问题的根本解决,是今后一个时期,探索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和政策的基本方向。

三、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和方向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实践的不断深入,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批城镇化的成功案例。例如,以各类市场带动城镇化的“温州模式”、以产业升级带动城镇化的“宁夏模式”、以集体经济助推城镇化的“苏南模式”、以宅基地置换拉动城镇化的“天津模式”等,纵观这些成功案例和经验,结合上述我国城镇化面临的实际问题,我们认为,今后促进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具体措施如下:

1. 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具体措施

第一,加强规划,促进城镇化基础制度建设。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和突破城镇化发展中的上述问题和障碍,从各地经验来看,首先,必须制度先行、规划先行。其中,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公共文化培育规划等必须有机衔接,齐头并进。其次,在实践方面,要因地制宜,大力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齐头并进,合理安置农村转移劳动力。需要注意的是,近年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速度有所放慢。今后,城镇化的产业支撑,应该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为农业生产提供生产要素配套的各种生产和服务活动。再者,必须加快构建以城市为中心,以小城镇为骨干,以中心村和新型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镇体系。

第二,鼓励竞争,完善要素流动管理制度。从各地的成功经验来看,城镇化的推进及相关制度建设、体系建设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建立多层次一体化的城乡市场,鼓励开展多元化竞争。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为了消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真正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应不断完善土地承包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强化中心乡镇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促进公共就业服务向乡村延伸,推进城乡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帮助解决长期在城镇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的落户问题,让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使农民逐步向产业工人转换。

第三,优化服务,提升村庄综合治理水平。城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标志,是提升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综合服务水平。为了完善村庄的功能,一要按照统筹兼顾、确保重点的原则,统筹城乡水、电、热、气、房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村庄的承载力。二要按照优质、高效的要求,在村庄服务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引入竞争机制,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形成筹资渠道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设施使用商品化和设施管理规范化的创新机制。其

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要加大对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另一方面,还要开拓多条途径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村庄的综合治理能力。同时,应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制度,增强制度建设的法定性、权威性和严肃性。

第四,创新理念、提高农民群体自觉行为。根据以人为本的原则,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应该是农民。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不能也不应该违背农民的意愿。从各地的实践情况看,农民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还是非常乐意接受的。但是,由于宣传不到位,许多农民对国家政策不了解,甚至一无所知,造成目前农民对城镇化的认识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大多数青年农民不愿意留在农村,导致现在农村居住人员基本是老人、妇幼,缺乏中坚力量;二是长期的农村居住和生活,使得多数人已经习惯过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新的生活方式,一时难以适应;三是还有部分农民认为城镇化发展是政府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农民的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延缓了城镇化的进程。

第五,加强引导,扩大宣传力度和影响力。为了保证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发挥广大市民在城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应加强对不同层次的城市人口群体的政策宣传。首先,应以政策为指导,通过对城镇化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和教育,进一步增强对“举止高雅,精神文明,城乡和谐”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次,应加强对城市文化的普及,要让农民了解城市生活的基本范式和行为准则,在思想上认识和理解市民精神和公民理念。再者,应有重点、有针对性地选择典型事例开展宣传,为市民提供可以模仿学习的榜样,激发他们的热情和信心,鼓励合作、奉献、包容、互助的市民精神。

2.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政策方向

为了促进我国城镇化的科学发展,有效解决和克服上述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和障碍,必须把推进城镇化当作今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充分认识和理解城镇化过程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的基础上,把握好城镇化的政策方向。

首先,必须认清城镇化的艰巨性,理解城镇化是要建设村庄而不是消灭农村。实际上,只要把农村的水、电、热、气、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好,农村会比城市更舒适,这也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城镇化成功地区的实践也证明,城镇化就是要提高村庄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服务的整体功能,而不是消灭村庄,因为村庄才是最美的社区。

其次,必须留意城镇化的长期性,时刻注意加强新型产业和人力资本的培育。城镇化最终是人的城镇化,从 2005 年开始,我国许多地方开展了“新农村建设”,但是不少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只是停留在村庄建设的层面,没有上升到人的层面。前面已经指出,我国的城镇化正处于“半城镇化”“半市场化”的阶段,怎样才能解决这个“半”字,关键是要在“培育人、发展人”上下功夫。

再者,必须研究城镇化的复杂性,充分尊重群众“自下而上”的选择和意愿。不同地区的城镇化道路可能是不一样的,必须尊重群众的自主选择。例如,在大城市郊区,城镇化的发展跟城市关联非常紧密,农民就有可能逐渐就变成市民;在远郊区和农业地区,农民有强烈的发展欲望和要求,那就应该按照农业发展的规律,走商品化、集约化、组织化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基础不稳”和“质量不高”的问题,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农村产业支撑和人力之本支撑条件,夯实城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全力克服城镇化过程中的“认识困境”和“制度困境”,优化城镇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和思想基础。为此,必须从认识论的高度把握农村和城市之间存在的互补性、依存性的内在规律;真正理解城镇化的关键,是要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寻求“帕累托改善”的合理空间,确保城乡关系的和谐。我们认为,一个公平、开放的城市和一个进步、文明的农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政策方向,就是要实现城市 and 农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 [2] 西奥多·W.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 [3]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法德农民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4] 保罗·诺克斯等撰,顾朝林译:《城市化》,北京:科

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 [5] 宋洪远主编:《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 年版。
- [6] 段应碧主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9 年版。
- [7] 徐勇主编:《中国农村调查 2012 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 [8]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3 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年版。

A Discussion about the Way and the Direction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Zhang Z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Various new urbanization patterns have sprung up constantly in recent years. But some new problems have also been exposed in the meantime. If these problems can not be corrected promptly, the practic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may possibly go to the other extreme, and even the situation may occur in which urban and rural areas may develop in opposite directions.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core of urbanization is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biggest hidden danger of urbanization is its unstable foundation, and the core problem is its low quality.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se problems is our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new-type urbanization,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semi-marketization, semi-urbanization

(责任编辑 管 琴)